

文化上海

董丽敏 曾军

主
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大学出版社

文化上海

常州大学
藏书

董丽敏 曾军

主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上海/董丽敏,曾军主编.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671-0602-4

I. ①文… II. ①董… ②曾… III. ①文化事业-建设-研究-上海市 IV. ①G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5077 号

责任编辑:焦贵平

封面设计:倪天辰

技术编辑:金鑫 章斐

文化上海

董丽敏 曾军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9 字数280千字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0602-4/G · 1109 定价:60.00元

本书得到上海大学 085 内涵建设项目
“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资助

《文化上海》(第一辑)编委会

编委会成员：王晓明 陶飞亚 董丽敏 曾 军
曹 谦 杨卫华 朱善杰

主 编：董丽敏 曾 军

主 编 助 理：曹 谦

目 contents

录

质疑“城市”

“魔都”，摩登	倪 伟	5
平民的上海	薛 毅	9
如何创建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 ——上海社会主义工人新村建设历史的启示	罗 岗	15
“新上海”：怀旧与招魂	董丽敏	18
“快城”与“慢城”	闵冬潮	23
1960 年代的城市想象	Christopher Connery	26
意大利：“发展”的城市和“进步”的城市	山 谷	31
首尔(Seoul)：城市化与文化经济	姜来熙	34

城市文化再解读

世界城市建设中文化因素的凸显	金元浦	38
“希望空间”或是“想象世界”：发展后中国城市文化的空间生产	李 杨	47
让劳动者分享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流转”中的城市转型	刘方喜	53
谁的城市文化？何种矛盾？	倪文尖	59
上海市民的城市认同及其问题	曾 军	62
上海城市的形象变迁及其修辞策略	苗 田	70



上海住宅：什么样才是我们的宜居家园	曹 谦	83
-------------------------	-----	----

“城”长的烦恼

城市只是一处“名利场”吗?	王晓明	10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孙晓忠	104
城市里的“自然”	罗小茗	107
漫谈“低碳”	朱善杰	111
校园内外的“城市化”与教育自主	李 晨	115
灰色上海	毛 尖	118
“北外滩”：资本又要“传奇”了	王晓明	120

“文化上海”的宗教维度

文化上海建构中的宗教背影	杨卫华	123
都市佛教与文化上海	成 庆	128
上海道教与文化上海	杨卫华	136
基督宗教与文化上海	杨卫华	146
伊斯兰教与文化上海	舒 健	160

城市现场直击

父亲来上海	孙晓忠	166
当“蝙蝠侠”遭遇“占领”	罗小茗	168
低级和趣味	毛 尖	170
小贩的尊严	张炼红	172
新竹阿姨和崇明阿婆	王晓明	174
房东成挡箭牌的背后	高 明	176

老马不见了	钟雪萍	179
-------------	-----	-----

“现代”都市文化生产

“现代”的多重面向

——《现代》时期施蛰存的文学理念与编辑实践

.....	董丽敏	183
-------	-----	-----

“市场”观念下的文学生产

——陈蝶衣与《万象》	蒋莉莉	199
------------------	-----	-----

何种“知识” 怎样传播

——以“万有文库”第一集的发行为中心	周 敏	212
--------------------------	-----	-----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

——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邓金明	229
-------------------------	-----	-----

亭子间文化：现代都市亚文化的情感地理特征	朱 军	243
----------------------------	-----	-----

上海：乡土中国的他者

——王安忆部分小说中的上海镜像分析	郭春林	253
-------------------------	-----	-----

移民、他者化与身份认同：电影里再现的上海人	林春城	270
-----------------------------	-----	-----

论区域的形成与后殖民问题：香港和珠三角的当代艺术

..... 卡罗林·卡蒂尔著 黄珊译	283
--------------------	-----

综 述

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文化矛盾	谢 非	291
-----------------------	-----	-----

后记	编 者	297
----------	-----	-----



质疑“城市”





“魔都”，摩登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说过,城市是一首诗,一首展开符指(signifier)的诗。如果把上海比作一首诗,那么外滩就是这首诗的开篇。

从东北角的外白渡桥迤逦向南至金陵东路,在长达 1.5 公里的狭长地带里,鳞次栉比地矗立着几十幢有着鲜明西洋古典建筑风格的高楼大厦,它们构成的天际线,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是上海引以为傲的金字脸面。在租界刚开辟时,外滩还只是黄浦江边的一片荒滩,只有纤夫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在早期英国殖民者眼里,外滩是一个与二三友朋散步聊天的好地方,江风习习,莎草连天,风物变幻,惹起英伦游子的一腔愁绪。随着租界不断扩张,外滩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原先的纤道拓宽为 30 英尺宽的马路,在马路和一排排洋行建筑之间还有 30 英尺宽的草坪和 8 英尺宽的步道,道旁植有垂柳等树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里,外滩建筑迎来了又一次大规模改建,原先两三层高的洋行建筑被更高大、更气派的大楼取代,著名的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和沙逊大厦陆续建成,成为外滩的新地标,汇丰银行大楼更以其奢华被誉为“从白令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最华贵的建筑”。世界各国的银行都纷纷在外滩建造大楼,到 1949 年为止,麇集于外滩的中外金融机构达 600 余家,金融市场规模仅次于当时的伦敦和纽约,号称“东方华尔街”。矗立于外滩的这些银行大楼与其说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迅速发展,不如说是象征着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占领。

外滩若是上海的门面,那从外滩西向至静安寺,绵延长达 5 公里的南京路,就是上海的脊柱。早在十九世纪末,南京路就已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购物

中心：在河南路以东的路段聚集了泰兴公司、福利公司、惠罗公司和汇司公司四大英商百货公司；河南路以西的路段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五花八门的中式商号，有金铺银楼、药房鞋店、茶园酒家……1917年，先施公司落成开业，在此后不到二十年里，永安、新新、大新三大百货公司相继开业，它们和先施公司一起象征着南京路的绮靡和奢华。

十里洋场的浮华似乎愈益彰显了传统中国的腐朽和没落。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的开头，为避匪祸来到上海的吴老太爷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龙轿车里驱驰于南京路上，他看到的是“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他眼前，无穷无尽的路灯杆宛如长着一对大眼睛的怪物，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啾——啾——地吼着，闪电般地向他冲过来，冲过来……这大概也可说是本雅明所谓的现代性的“震惊”体验吧，手握《太上感应篇》的吴老太爷终于在这“震惊”中丧了命。

南京路见证了资本主义商业消费的兴起，也铭刻了新兴历史力量成长的足迹。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被鲜血浇淋的南京路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反抗一切外来奴役的战斗檄言。从丁玲的小说《一九三〇春上海（之二）》，我们大概可以稍稍领略到南京路所蕴含的复杂的历史内涵。在小说结尾，革命青年望微在参加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时被捕，他透过警车的铁丝网看见他的资产阶级女友玛丽手里拎着许多包包，正从大百货公司的门口走出来，那样的美丽、快乐。在一个疾风暴雨的时代，在同一条街上，人们却行走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仿佛并行不悖。这种幻觉当然是历史的诡计。三十年后，在“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里，同样包含着“革命”与资产阶级享乐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这一次是“革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福州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是另外两条繁华的街衢。福州路俗称四马路，与南京路平行，东起外滩，西至跑马场，在20世纪初南京路兴盛之前，它一直是上海最热闹的地带。这条街上几乎云集了上海所有的报馆和书局，另有许多戏院书场、茶馆舞厅、酒肆旅馆，靠近跑马场的西段更是著名的色情区，妓馆林立，流莺成群。这个色情空间的制度化存在或许能证明资本主义已将包



括人的身体、欲望在内的一切都变成了商业买卖的对象。霞飞路则位于法租界，这条植有法国梧桐树的林荫大道充满了浓郁的异国风情，两旁的店铺以经营西餐、西服和欧美时尚消费品为特色。在秋日迷离的阳光下，踩着枯黄的梧桐叶，耳畔是有轨电车的叮铃声，眼前是洋溢着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风情的商店，在这儿可以喝到正宗的卡布基诺咖啡，享用丰盛的俄式大餐，买到与欧美同步的新潮时装……一切都让人产生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欧美侨民会感到仿佛回到家乡的亲切，本地的中国绅士则会将这异域风情误认为文明进步的象征。在此意义上，霞飞路和迪斯尼乐园一样，都是用符号堆砌起来的，是那种让人陷入幻觉之中的拟像(simulacrum)。

上海绝非只是时尚之都，它还是一个“魔都”，这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对上海的命名。村松所想象的“魔都”是放荡的，颓废的，它代表着一种恶魔般的、然而又是自由不羁的生活，散发出一股糜烂的气息。用日本诗人金子光晴的话说，这是上海所独具的一种“臭气”：“那种臭气就像是把性和生死的不安纠缠到底的、任意荡尽的欲望的、不断地一边死亡一边渗透的、心烦意乱般的、酸的人间气味”，这也是张爱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描述的那股“如匪浣衣”的气味，暧昧、肮脏、令人作呕，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气味。

对于生活在逼仄的石库门里弄的大多数普通市民来说，所谓的摩登生活其实很遥远。与他们的生活日夕相关的，不是外滩和南京路上的摩天大楼，也不是霞飞路上的旖旎风情，而是马桶、煤烟炉、大饼店、老虎灶、小菜场这些似乎跟摩登无关的器具和处所，很多人的生活天地几乎就局限在自家弄堂和附近的几个街区内，他们就这样经受了历次战乱的恐怖和萧条，坚韧而又不无屈辱地活着。这个沉静似海的石库门世界是摩天大楼矗立其上的灰色底层，是上海摩登的沉着的底色。

在石库门的世界之外，还有着大片的棚户区，它们像城市的疮痍遍布于市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众多新开办的工厂吸引了大批来自内地的贫苦农民，他们租不起房，只能在市郊荒地上搭起草棚，以避风雨。久而久之，这些草棚连缀成片，变成规模惊人的贫民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著名的棚户区药水弄约有居民5000户，其环境极为恶劣。

棚屋的搭建材料都是见火就着的芦席、稻草、麦秆、旧木板等等，根本无法阻挡风雨，一场大雨之后，屋里常常是水深及膝，外面的道路更是泥泞不堪。棚户区没有必要的卫生设施，生活垃圾和阴沟污物遍地都是，很多居民还在家里养猪、养鸡，猪圈紧挨着住房，鸡晚上就呆在床板底下，人们就这样和猪和鸡一起生，一起死。棚户区代表着另一个上海，一个庞大的底层的上海。据1950年的统计，在全上海共有13万个不同类型的棚屋，住着近20万户人家，总人口将近100万，是上海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这是旧上海沉默的大多数，是被抹煞在摩登的光晕之外的真实的世界。

日本作家吉行英助曾把上海比作中国的花园，“被世界各国金融资本支配的中国，在它的花园的肥料上散发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浓郁的政治气味，除了这种感受之外别无他物”。其实，这是比政治更复杂的气味，是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狐臭。旧上海曾被誉为“东方巴黎”，这支奇葩是用怎样的肥料沤成的？从外滩和南京路的摩天楼到嘈杂湫隘的弄堂，再到散发着恶臭的棚户区，这些不同的都市空间组成了魔都上海的复杂多面性。都市空间的多样异质性正是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生产逻辑，它在生产出外滩、南京路、霞飞路的繁华时尚的同时，也必然要生产出福州路的色情区和苏州河边的棚户区。因此，所谓摩登不能只指涉消费主义的浮华景观和时尚生活方式，压迫奴役的血泪，挣扎反抗的怒吼，也是上海摩登题中应有之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曾说过，上海是“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的确，旧上海是少数人的天堂，是沉默的大众的地狱。然而，少数人享乐的天堂终究会被地狱之民的怒火焚毁，这已经得到以往历史的验证，也将未来再次得到验证。

（倪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平民的上海

苏州河由西向东，蜿蜒蜒蜒地流过这个城市。

这是作家、文学史家蔡翔 1995 年的散文《底层》的开头句子。对我而言，这篇风格沉郁的散文，特别是这个看起来颇为普通的句子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因为它开启了有关上海的另一记忆，开启了另外一种上海叙事。

主流的上海叙事首先产生于 1990 年代初的官方媒体。有一个事例被反复引用，说的是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海外游子们阔别 30 年后回到上海，看整个城市，惊叹它毫无变化，无论是城市格局、还是建筑风貌，最吸引人的仍然是 30 年前留下的。娱论借此来证明上海已经严重停滞，必须推动上海新一轮的发展，而这个事例被编制在上海必须改革的官方舆论里。此后的 20 年，上海的变化全球瞩目。我在新世纪第一次去东京，朋友把我带到最繁华的地段，我竟感觉不出它和上海的区别了。

所谓“海派文化”，“海派”这个词流行于 1930 年代京沪两地作家论战的时候，它原本是一个贬义词，是指商业利益侵吞和腐蚀精神产品的现象。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说一个人很“海派”，意味着这人爱炫富、缺少操守、喜好钻营、花里胡哨，是勤奋、朴素、实在的正派上海人的对立面。1990 年代初，人们重新定义这个概念，它成了面向世界、海纳百川的精神象征，成了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标签。官方的言辞高调而抽象，官方的行动却很具体，比如将外滩建筑群里的办公楼撤空，重新请回西方银行，而且各银行搬回原址；比如召集原本在十里洋场工作的如今已是老人的乐手，重新组织爵士乐队，在歌舞厅里展示风采，更不用说林林种种的金融交易市场和铺天盖地的广告了。而殖民

时期留下的公寓、别墅也被打造成新的风景,讲述着老上海的风花雪月。仿佛时光倒流,摩登上海复活了。

当然,最完整的上海叙事是由学者来完成的。几近显学的上海研究不再讨论五卅运动、工人武装起义,也不讨论殖民地问题、沦陷问题。老上海的文明——一种现代的可与西方价值相匹配的文明,成为研究的核心。一种更为简单更为通俗的叙事来自于位海外学者的手笔,他的著作声称要“重绘上海地图”,这地图包括的区域竟然只有以外滩、南京路和霞飞路为象征的英美租界和法租界。

从时间上抹去 1949 年后 30 年的存在,从空间上抹去底层的存在,上海叙事以此为前提。

而以苏州河为基准,重看上海,产生的图像将截然不同。蔡翔说:

在我独自伫立在苏州河的北岸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种古怪的幻觉。我会看见在污浊的河面上,漂来一只小小的木船,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从遥远的家乡,漂向上海。然后在这里上岸,用芦席搭起一座小小的棚屋。那就是我的祖先,我的半个城市的祖先。

农村的解体、战乱和贫困,驱使“半个城市的祖先”到上海来讨生活,他们从水路到铁路,并在河道与铁路两旁搭建最简陋的草棚,有将毛竹弯成半圆、仅仅齐腰高的“滚地龙”,有将竹子插入河中,一端搭在河岸上的“水上阁楼”,还有直接将小船拖到岸上就居住的“旱船”,这些和另外一些“简屋”构成的区域,逐渐向厂区延伸,构成了上海的“棚户区”,密密麻麻在上海城区外围成一圈。棚户区是最脏乱的地方,在外人看来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卖淫、黑社会猖獗的地方。而半个上海就由这样的空间构成。人们去工厂做工、码头扛包、澡堂搓澡、街头修鞋,不服命运的敢于铤而走险的也许会加入黑帮。

作家夏衍写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讲述更为悲惨的资本主义环境下的当代奴隶生活。包工头到贫困的乡下招募年轻女子,用 20 元大洋买断女子的三年工龄到日本纱厂做工。每日两粥一饭,睡在工厂的通铺内,三年的工资全归



包工头所有。作者说：“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鲁迅曾这样描绘上海的图像：中间是洋人，接近他们一圈的是中国的商人和读书人，圈子外面是中国的苦人。而中国的苦人是不识字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鲁迅看来，中国是无声的中国。鲁迅也曾用此来预言中国的令人绝望的未来。

上海的读书人是另外一群外来人，他们来自乡绅的家庭，或者是小城镇商人的家庭，由于科举制的中止而迅速向大城市聚拢，在“洋学堂”念书，毕业后到城市的中上层找职位，用鲁迅的概念来说，其中一部分变成“西崽”，侍从有权势的洋人。但是，自觉地从文化与政治上否定这个城市的，也来自读书人阶层，其中一部分成为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们首先做的就是组织和发动城市底层进行斗争。虽然政治斗争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而失败，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1930年代，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牢牢地占领了这个城市。1930年代的上海文化与1940年代沦陷时期之不同就在于，前者有着共产党的左翼文化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化和上海摩登文化相互搏杀的动态过程，后者倒是摩登文化完全站在了前台。而左翼文化以阶级差异和斗争为观察世界的方式，用文学与电影影响市民的趣味，尤其是电影的成功，对推动上海城市文化的变化有很大的贡献。

诉说底层的苦难是1930年代中国文学和艺术的一大主题，左翼文化更进一步想要从苦难叙述中召唤底层的政治主体，底层革命的可能。但是无论是苦难还是革命，作家们更熟悉的还是乡村的情况，更能把乡村故事说得具体生动，谈论城市底层则显得抽象。因为城市更是一个区隔的空间。比较贫困的作家所居住的环境仍然不是棚户区所能比拟的，人们称这些作家为“亭子间”作家，指的是他们居住在石库门（上海老式里弄住宅）建筑中最狭窄的空间里写作。除非搞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作家们很少涉足底层空间。因此底层的主体性很难被表述出来。茅盾描述一个小偷如何被感召，加入游行队伍，与他写农村在苦难中觉醒的《农村三部曲》相差甚远。郭沫若讲述一个孩子被机器轧去一只手，他最后用这只手狠揍傲慢凶狠的权贵。这样的反抗性很难说服

读者。夏衍在《包身工》中感叹,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团结和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托尔斯泰参与调查城市贫困人口的时候力图接近底层,他本以为底层就是穷困的代名词,但他发现那里有他无法接近的完整的鲜活的文化。而鲁迅预言,只有无产阶级有了识字能力后,自己写作,才有可能出现无产阶级文学。

而蔡翔笔下的底层,却不仅仅是贫困问题,他同样深情地讲述了底层人的质朴,贫困中的道德感,以及人之间的患难相助。在1990年代中期,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平民色彩越来越淡化的时候,这样的描述有助于人们遥想1949年以后上海城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底层作为主体所打下的深深烙印。概言之,一种与农村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工人阶级文化,促使上海这座“东方的巴黎”变成了一个平民的城市。都市研究的一大主题是讨论共同体的“有机文化”如何被都市打碎,使人成为“原子”式的个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城市却创造了一种可能,使原子个体复归于共同体之中。

同样对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叙事有诸多不满的作家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富萍》中讲述了一个女孩从乡下到上海的故事。富萍原本住在淮海路,这是即便在新中国,也是最富有老上海都市气息的地方,但富萍最后在梅家桥,一个贫困而有乡村生活意味的底层工人聚集的地方找到了归宿,促使富萍如此选择的原因不是在淮海路遭遇多大的不幸或者遭到都市的拒绝,不是被迫的选择,而是她作为主体的主动的生活选择。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王安忆的印象,她先前所创作的《长恨歌》往往被读解为对老上海的怀旧之作。

应该说,在工业时代,工人阶级的原初居住环境都包含着在城市中保留乡村生活方式的可能。即便是现在,中国各城市的“城中村”,也还能体现乡村气息——一个熟人的世界,由于生活条件无法融入到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中,从而保留了朴素的、互相帮衬的人际关系。但是,它与城市的其他区域毫无关系,而且时时处于被吞噬的危险中。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对城市的改造,不仅仅体现为将消费性城市变革为生产性城市,将依附性的空间,妓院、舞场、